

检察业务学习资料

5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印

一九八一年一月

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检察业务学习资料

5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印

一九八一年一月

为了提高检察干部的写作水平，提高文件的质量，特翻印几篇关于写文章的讲话，供学习参考。这些讲话是根据当时记录整理的，未经本人审阅，现又时隔二十多年，当前在写作文件上存在的问题，已和当时不尽相同。因此，希望各地结合当前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学习，改进工作，并希望妥为保存，不要外传。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目 录

1. 胡乔木同志在写文件方法座谈会上的讲话…………… (1)
2. 在公安工作上怎样把公开的文字宣传做得更好一些?
——胡乔木同志在公安部的一次报告(记录)
…………… (23)
3. 怎样才能使文章写得准确、鲜明、生动?
——郭沫若同志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
记者问…………… (32)

胡乔木同志在写文件方法 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3月4日——

（这个记录，未经审阅，仅供参考）

中央下了个命令，要我来讲一下写文件里面的一些问题，怎样能够实现毛主席在“六十条”里面提出的要求，先声明我讲不好，只是提些意见，作为参考资料。写文件和做工作差不多，叫个人来谈怎样把工作做好，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文章怎么叫好，怎么叫不好，里面道理很多，我知道得有限，如何使文章按中央的要求能够让人看下去，我想谈四个问题：

1.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认识；
2. 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问题；
3. 看条件：什么样文章，给什么人看，要求不同；
4. 怎么办？用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快地达到目的。

现在分别谈一下：

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工作方法六十条”中除37条专门讲这个问题外，还有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三十六条、四十二条、四十三条、四十七条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三十二条是说“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

法更坏。”三十三条是说“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三十六条是说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四十二条、四十三条是说学点文学、文法和逻辑。四十七条是说要培养“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这说明中央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为什么要重视这个问题？应该从政治上来看，各部门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人，都要依靠党、依靠群众。各部门工作条件不一样，各部门对自己的业务比较熟悉，党和群众对这些就不那么熟悉。可是工作要依靠党、依靠群众，这就要向党和群众作宣传，使他了解，不了解就不能依靠，所以工作中要有文件、报告。要达到宣传的目的，就要讲究方法，使对方能够懂，要合乎三个要求：

（1）要引人看，要有好的介绍方法，要有吸引人的力量。毛主席常讲，文章的题目和头几句话很重要，首先头几句就给人的印象不好，人家就不愿意看。不仅引人看，还要人家能够一口气看到底。

（2）要使人看得懂，人家看不懂或不完全懂，就看不下去，看下去了也难得动员他。似懂非懂，目的就达不到。

（3）要能说服人，打动人。如果看完了、看懂了，说服不了人，还是达不到目的。

道理是很明显的。当我们写文章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的道理是对的，要使人相信，要说服党和人民群众，我们不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说服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写文件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懂你不懂，就有了矛盾，就要处理，就要用道理说服人，不但说服人，还要能打动人，说服着重在理智方面，打动人除了理智方面还带有一点感情，

使看的人真正被你动员起来。

文章如果不合乎上面三点要求，写了人家不看，不能说服人，打动人，文章就等于没有写，就达不到依靠党和依靠群众。我们作工作希望得到党委的同意和支持，但文章党委没有看，或者看了没有懂，党委就不能了解和赞助，群众就动员不起来，这样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就会陷于孤立的状态。孤立无援，得不到党和群众的支持，就会犯错误，即使工作方针意见是正确的，也会犯错误，因为你脱离了党和群众。写文章一定要讲究方法，才能达到政治的目的。为了使党和群众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为了动员群众，这是个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主席这次的“六十条”才提出的，很早以前就再三提出过。为了使大家回忆起来方便，我在这里提一下：主席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中的八条罪状，里面有几句话现在还是适用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这两条情况现在少一些了。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所谓做宣传工作的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是作宣传工作的，向中央写个报告，是在向中央宣传，向毛主席写个报告，是在向毛主席宣传，乃至向中央讲几句话都是在作宣传，作宣传就要看对象，要作解释。不管人家懂不懂，一直讲下去，就是不看对象，这个批评，现在还适用。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象个瘪三”。这个

批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在很多方面还是适用的。语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要向人民群众、向外国语言、向古人语言学习。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文中说：“……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象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这些话对我们今天研究问题是有意义的。这篇文章是1942年写的，离现在已有16年了。

其次，1951年2月，中央曾发出“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指示里面说：“现在党政军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写得好的，确实不少。这些电报或文件，写得清楚明确，生动活泼，使人便于阅读，发生极大效力。但同时尚有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兹分别规定纠正办法如下：

（一）不许滥用省略。……例如“上海”不得写成“沪”，……凡月日時，概用普通数字，不得用地支和韵目。……凡

有特别生僻的语词，其意义为多数阅读者所不能了解者，应作必要的注释。

（二）必须遵守文法。电报文句虽应力求简洁，但不得违背文法。必要的主词、述词、宾词，必须完备无误。单句、复句，必须分清。代名词，必须紧跟所代的名词。形容词、付词词尾，尽可能分用“的”、“地”，加以区别（形容词是形容名词的，例如“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故在名词之前用“的”字区别之。付词主要是形容动词的，例如“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故在动词之前以“地”字区别之）。如此，方能使条理分明，意义确定。至于信件和公布的文件，不但文字应当完全，标点亦须正确。为解决此一问题，……望地方县委、县政府以上、军队师以上负责干部，至少有一人学会文法，以便负责修正文电字句。

（三）纠正交代不明的现象。……每件事都要交代六个“什么”，即什么事、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样子、什么原故。仅在绝对明了时，始可有所省略。

（四）纠正眉目不清的现象。除简短者外，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晋代陆机“文赋”中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意思），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释。……

（五）凡文电必须认真压缩。各级领导同志责任重大，事务繁剧。向领导同志或机关请示或作报告时，必须反对两种倾向，即应请示报告而不请示报告的倾向和不应请示报告而随便请示报告的倾向。在写请示文电或写报告时，必须注意文字的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阅读。现在有很多文电，既嫌冗长，又嫌杂乱。其原因，是未经压缩，说了许多无须

说的空话，或者没有分清条理，把杂乱无章的草稿随便往上送。其结果，使领导同志对这些文电很难看，或者就没有看，等于白写。今后一切向上级机关请示或报告情况和对下级发布指示的文电，所有起草和批阅文电的同志，必须以负责的精神，至再至三地分清条理，压缩文字，然后发出，否则应受批评。但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这是1951年的指示。另外，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书中，对中共贵州省绥阳县宣传部写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加了这样的按语：“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170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那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末了两句话是对编辑讲的，按刚才的电报上说的，所有党组书记都要作编辑工作。

我把毛主席的话重说一下，一是为了便于大家回忆，一是为了说明中央提出这个要求不是新的问题，而是曾经多次提出过，真正是三令五申，恐怕不只是三令五申，而是五令十申了。可见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政治性的问题，把这个环节搞好很重要。我们不是要做促进派吗？如果我们把文件搞好一些，使中央早下决心，及时动员群众来做，就可以把工作干得更快、更好，就可以做促进派。否则就不能多快好省，就是违反了多快好省的要求。当然不是说文章写得差一点就什么工作也不能作了，而是说作用要差一点，使本可发挥的更大效力的文章，不能得到发挥。这是不是因为毛主席会写文件，会诗词歌赋而产生的偏爱呢？不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我们作群众工作，要向人民负责任，要向人民宣传，要发动群众、说服群众，必须把文字工作搞好。关于马克思，法国有个作家叫保尔·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他写的“忆马克思”的文章中说：“马克思永远是非常认真慎重地工作。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权威的权威人士的实证的。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

“参考原始资料的习惯使他连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读到了，只有他才引用这些作家。‘资本论’里引证了那么多无名作家的话，人们也许会以为这是要炫耀自己的学识渊博。但马克思却决不是出于这种动机。他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他觉得指出第一个发表某一思想或把这种思想阐述得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为精确的作家

的名字（不管这个作家是多么不重要和多么不知名）是他的责任”。

“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还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研究好一个问题时他决不谈论这个问题。他决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没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给别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天他向我说，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这是说马克思著书，与我们工作中写文件还不一样，但可从这里看出他认真的精神。

关于列宁，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有个“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的小册子，着重讲列宁如何写文章，其中有一篇说列宁是党刊物底编辑者和组织者，她说：“究竟列宁注意编辑者工作的哪些方面，这可从他于1913年致卡斯帕洛夫同志的信中看得出来。卡斯帕洛夫给教育杂志写了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依里奇写信给他说：‘亲爱的同志！你的文章我已收到并阅读过了。据我的意见，主题选择得很好，发挥亦颇正确，但文艺上的修饰还欠工夫。有过多的——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不适宜于讨论理论问题文章的（鼓动）闲话。据我的意见，或者请你自已再改作一遍，或者由我们来试试。’这样，选择主题，发挥主题，文艺上的修饰，这就是依里奇极为注意的三大要素”。“文艺上的写作方法问题。文体应与内容相呼应。文章的语言和腔调应适合文章底论旨。写作，这是一种艺术。腔调、体裁、善于生动地叙述、进行必需的比较，这是很重要的。依里奇对写作方法问题赋予了极大的意义，他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体裁上用了

极大的功夫。他能一连坐几个钟头去翻阅各种各样的字典，连达尔底字典也在内，最后一个时期他特别关心于这一字典的再版问题。依里奇的文字是很丰富的，他使用了许多民间的成语和字句。依里奇在从流放处致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说，——我最愿意的，是要学会写工人读物。在我从流放处写给列宁母亲的一封信里曾描写依里奇如何在这个工作上来利用我的帮助；有时我应把自己装成象一个既不懂外国术语和科学术语，也不懂某些人所共知事物的‘无知’读者”。可见马克思、列宁对待写文章的态度都是非常认真的，毛主席是继承了他们的作风的，毛主席的作风是与他们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着重这个问题是合理的。我们写的文章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让党早下决心，作出判断，作出决定，发动群众，使群众懂得各方面的利害，按照党的要求积极地去。为要达到这些目的，就要认真注意，把文章写得好一些，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中央一再强调的，无论马、恩、列、斯，都很注意这个问题。

二、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的问题

六十条中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个问题恐怕讲不好，要讲好，非得好好研究一下政府的文件，从文件发出的效果看那些好，那些是受过批评的，才能有的放矢。这个问题，各部门自己研究可能更容易一些，我现在只能说一下对这个问题部分的想法：

1. 准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六十条”中的37条已有了说明。“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概念、判断、推理是逻辑学上的三个名词。概念相当于词，判断相当于句，推理相当于

两个以上的句子，如茶壶是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容易明了、容易准确，还有抽象的概念，如“多快好省”、“反冒进”就比较复杂，比较抽象，名词固然可作概念，形容词也可变为概念、转为名词，概念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多快好省”是事物的状态，是客观存在的，概念是不是明确，要看我们说的话是否符合所代表的客观的东西，一句话可以代表好几个概念，代表的范围大小不同，这里指这个，那里指那个，完全不同或者部分不同。人的思想基本的工具是概念，如基本建设离不了几样材料——概念就是基本的材料，基本建设的材料，无非是木材、钢材、水泥，一句话无非是概念组成的述语，肯定或否定，好或不好。“高速度”，究竟怎样才算高速度，是对什么东西说的，离开了一定的范围说高速度就不明确。

判断，有了几个概念就可以作判断，如茶壶需要大量生产，大量生产就是个概念，这个概念，比较简单。再如每县搞发电厂，这就是个判断，县是抽象的，不一定代表那个县，可以代表通县，也可以代表别的县，通县也还是个概念，还不知道在那个村庄，搞发电厂也是个概念，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对什么不对，这就是判断。判断对不对，就要看先后次序对不对，有没有条件，有没有可能。

推理就是从这一句话引导到那一句话，由第一句话引到第二句话，第一句与第二句之间的关系就是推理，有时两句话没有推理关系，但很多时候有推理关系，就譬如六十条中的37条所说的这一段话：“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这就是推理。紧接着又说：“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这也是推理。

既然是大灾难，当然就要改变。下面是“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这也是推理。下面是“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这也是推理，这里面有许多论证省略了，因为完全可以看懂所以省略了，如要说得完全，大致是：既然这么重要，大老爷就用得着管；既然大老爷用得着管，无非是说二把手三把手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对问题不能完全熟悉，或者如果仅仅委托二把手三把手来搞，自己不来讲究这个问题，不来注意这个问题，自己的思想也就不能清楚……等等的意思。

关于准确性的问题，即概念、判断、推理的正确与否的问题。准确性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要看概念是不是明确，判断推理对不对，个别的简单的事情也有判断，看字句对不对，数目字是不是有错的，再来肯定或否定，或者是看推理对不对，这是形式逻辑里面讲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的问题，苏联出版了一批这样的书，有苏联人写的，也有中国人写的。比较薄的本子还不太难看，可以找来看看，看不懂也没有关系，看总比不看好。

同一律是指说了一个概念，不要在另外的地方改变，一个概念代表的客观事物不要改变，第一句话说了一个东西，第二句话又说了另外一个东西，就只好推理，说张三就说张三，不要前面是张三，后面又不是张三。

矛盾律是指说张三那件事是做得对的，不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是做得不对，说是星期三，不要又说是星期四。

排中律是指对的还是不对，好的还是不好，要是非分明，不能说好又不好，对又不对，或者是不说对，也不说不不对，是非不分。

充足理由律：判断也好，推理也好，理由要充分，要使人驳不倒。这是指对个别的事物。

还有一方面是比较大范围的事实的判断，涉及根本立场、方针、方法。涉及简单的问题是形式逻辑，涉及到复杂的问题，即涉及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涉及到历史唯物论、辩证法、阶级立场、社会主义立场等等。因为“六十条”在这个地方讲准确性，比较着重写文件，所以比较起来，没有着重谈事物的主流、支流，没有谈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没有着重谈对大量事物的本质如何分析，因为别的地方已经讲得很多了。

搞文件，首先要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如果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即使有个别的判断、推理是正确的，也不能挽救这一篇文章，使其由错误的变成正确的。这是要注意的根本性的问题。方法首先要分析正面反面，挑出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两个主要侧面，这是根本的方法。至于每句话的判断、推理的关系，也是逻辑，属于形式逻辑。

总之，写文章首先要讲辩证法，同时还要讲形式逻辑，两样东西并用。

2.关于鲜明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1)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写文件与写小说剧本不同，鲜明性的要求不同，关键是观点要突出。写文章无论是对上、对下、对内、对外，都是为了宣传一个观点，观点是个判断，是推理来的，推理是从材料来的。所以，要鲜明首先要看观点和材料是否统一。如果观点和材料不统一，就象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第32条中说的：“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

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写文章用材料为了说明观点，文章写出来叫人家看不清楚，这是不鲜明，就是材料和观点没有联系好。观点是结论，材料是前提，是论据，论据要说明观点，每个观点应该接着有事实作证明。不能证明观点的事实就不要用。每个论点有论据，这是推理问题，从鲜明性来说，观点和论据要摆得合适。一个建筑要有材料，有结构，整个建筑还要有设计。写文章和盖房子一样，要看如何布局、设计、是否经济、合理、实用。观点和材料隔绝了，就象工厂的车间和原料离得很远，甚至中间隔了一道墙一样。如果说有些文章材料、观点互不联系，也是冤枉，他自己可能以为材料和观点联系了，但是离得太远了，太罗嗦了，或者不清楚，材料就不能说明观点，观点和材料，结论和论据要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关于写文章有句老话：“夹叙夹议”。议就是观点，叙就是材料。事实和观点要安排好，一段话要说明一个观点，要有相当的材料来证明这个观点，这段话，就鲜明，看起来就干净。如果一段话只有很多观点，或者事实很多，没有观点，看了以后就迷失方向，不知道要作什么。所以，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是首要的关键。

主席提出两个文件，一是少奇同志给中央的信，一是广西的报告。如少奇同志写给中央的信，为什么看起来很清楚，因为他提出的观点都有事实作证据，事实也是为了说明几个观点。一个是说红薯好吃，有事实。一个是说红薯是高产作物，对解决当前粮食问题大有帮助。现在有什么问题？河北省需要向外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是河北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要向全国推广，难于调运和保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就是夹叙夹议，作到了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材料和观点要统一不难作到，只要有意识地注意就不难。人的观